目　录

自传……陈明仁（1）

我的一生……方鼎英（38）

附录：方鼎英墓志……陈树华　方辉生（68）

记外祖父王礼培的生平事迹……易新夏（73）

熊希龄的一生……周秋光（80）

一代名医易南坡……易肃如(103)

回忆我的伯父杨端六……杨宜福(107)

我们所知道的陈嘉勋先生……黄时荣　黄曾甫(118)

周介褐先生事略……周仁济(121)

伯父刘兴传略……刘　岳(129)

回忆戴岳先生……潘　监(135)

先君陈浴新事略……陈守宁(143)

周斓小传……刘　岳(152)

鸭绒被创始人丁鹏翥……王和政(156)

化学教师郭德垂……郭道晖　郭道光(161)

龙伯坚事略……黎　丰(164)

简述父亲焦达悌的一生……焦传爱(178)

我所了解的石声汉教授……姜义安(18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周佛海的青少年时期……钟玉如(201)
杨致泽刘昭彭伯陵其人其事……周德民(209)

湘西会战中武阳遭遇战和武冈追击战…蔡鸿源　孙必有(216)
“湘游一纵”回忆录……赵　琦　陆民华　刘文通(233)

自　　传

陈明仁*

一、家　世

我于一九〇三年，出生在湖南醴陵东乡的一个名叫洪源冲的地方。祖父是一个雇农，一生忠厚勤劳，经常被人剥削欺负。一九三〇年去世。祖母同祖父一样忠诚，但管教子孙很严，治家颇有条理，于一九四六年病故。父亲最初是一个自耕农，中年以后，才逐渐拥有一点山地稻田，从几石发展到百多石，取得了绅士的地位。我母亲死得较早，她死时我才十三岁。接着我父亲又续了弦。我很小的时候，曾和本地一个农家女子谢芳如订了婚，因为母亲的死，我在十三岁那年，便和谢芳如结婚了。我兄弟五人，弟弟明礼，于一九四四年死了；明智、明陶一向在家；明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任警卫团长；姐姐四人都出嫁了。我生了两子一女，女儿早死，长子扬钊，曾在中央军校和金陵大学毕业，现在全国政协工作；次子扬铨，现在浙江大学读书。他们都已结了婚，孙儿三人，孙女三人，都还很小。我爱人谢芳如和我同甘共苦地生活了三十多年，她是旧社会一个典型的善良主妇，对于我生平求学的鼓励，服务社会的支持，以至后来参加解放事业的帮助，都是很大的，但一病三年，已于一九五〇年四月去世，这是我个人

* 陈明仁（1903—1974）系湖南醴陵人，曾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官，是湖南和平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起义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个传记手稿现存中央军委，是作者五十年代初所写。

和家庭一个极大的损失。

我父亲是一九三〇年死的。那时候浏醴交界一带，有一部分游击队活动，知道我在国民党军队里任旅长，于是派队伍向我家索取枪械。我父亲无以应付，致被他们掳走。后来县政府闻讯，派了保安队伍进攻，游击队在仓皇退却之际，无法顾及扣押中的人质，把我父亲寄押在一个农民家里，他得以逃回家来，由于他在押时受过多次刑讯，伤势很重，不久便死了。父亲的死，当时许多人认为是地方上很重大的事件，而我则根据唯心观点，认为命所注定，不愿深加计较。所以，当我回家奔丧的时候，始终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游击队不仇恨、不报复，免得多所牵连。甚至明知当地有些人参加了这一活动，都一概不去追究他们。我认为，我父亲的死，乃是由于下列几个原因：一是我当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在政治斗争的影响下，我父亲自然成了攻击的对象，我家中虽然没有枪械，但游击队向国民党军官追问枪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二是我在那时，每年生日，经常有些部属赠送若干大大小小的银质镀金的礼品，如寿星一类的东西，我都一概送存家中，乡间不知价值，误认为全是金银，因而负了一个富有的虚名，引起一般人注意，在这种情况下，游击队当时向我家有所需索，也就不足为怪；三是我父亲本身是一个当权地主，平常以好汉自居，喜欢过问地方的事，甚至欺负剥削劳动人民，与当地人民难免不结仇恨。所以我父亲的死，不能归咎于人，他和我都应该负责的。

我家在祖父时代，是极贫苦的，到父亲手里，才约计共买田一百多石租。父亲逝世后，到我兄弟分居时为止，由我买成田租共为一千石。分居后，我又续买田租八百石，连同以前所分乃独占有田租一千石。此后，在醴陵县城建有房屋一栋，南京建有平房两栋，在衡阳县有小型房子一所；其余在醴陵乡间，尚有部分园土、茶山、鱼塘等，为数不多。

由于我长年在外，全部租谷从来自己未收用过，而是用在家乡，做了一些所谓“公益事业”。计有：（一）创办小学五所，对贫苦子弟，实行强迫教育；（二）筹设药局一所，聘有医师为居民治病，医药费分为全费、半费、免费三种，而以免费为最多；（三）办义仓一个，专供度荒时，免息借贷；（四）每年冬天，根据地方造册，普遍救济附近贫民一次。此外，我每年回家一次或二次，每次必另筹措一笔钱，实行所谓济贫。济贫之外，近邻贫民有向我借钱的，也借给他们。其借贷分两种：一为还本不计息；一为还息不还本。如果有确实还不起的，便于我回家时，当面焚卷了事。而事实上，我在借钱的时候，并未计较其还与不还，所以我每次回家，当场焚券的事，是相当多的。

我这种拿着从劳动人民身上剥削而来的钱，转向劳动人民示惠的法子，连续达十年之久。至一九四七年回家时，计算结果，每年收的田租，不但完全用光，而且还欠很多债。于是，我不愿再行包办下去，而将这千担租除提存三百担分给妻儿们外，其余七百石，完全捐给地方，由地方上推人自己去经营，我不再直接负责了。

我的爱人，随我在外二十余年，平日是善于节约和储蓄的。一九四五年我因为在七十一军军长任内，亏空甚巨，又因好名，不愿拖欠“公款”，我知道她已陆续积存了黄金约一百六十两，于是向她商量变卖还帐。虽然她当初不肯，但经过多次争吵，终于变卖了。变卖所得，除弥补所亏空的公款外，还剩余法币五百万元（凭记忆约值黄金四十两），交七十一军上海办事处处长陈公杰，嘱其生息并经营些临时生意，以作那时家庭生活和儿女们的教育费用，这是我的家庭经济概况。在此，我还要附带交代一下，我与公家经济的关系。

我过去在国民党部队，由当连长起便抱定一个决心：即对士兵不克扣，对人民不勒索。如果要钱用，则向蒋介石要。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为我过去每年总得要见蒋介石一、二次；每次见他，他总要送我三、五千元，以笼络我好替他多多卖力效力。过去，我总自命比人家廉洁，没有直接贪污过钱钞。但到了今天，才发现这一部贪污史，不知从何说起，现在只能就比较重要的交代一下。

一、我对经济，一向强调公私分明，所以常认为一些田产、房屋，是我过去在做主官任内的薪水和特别费积累下来购买添置的；其他则是蒋介石个人送给我的，并不认为属于剥削。对于"公家经费"则主张公款公用，家中及私人绝不滥支。但事实上，我过去的生活，是相当浪费的。各种应酬以及接济部属们的费用，是相当浩繁的。这笔钱真不知花费了多少。军需人员为了应付各种花费，于是吃缺、生息、做生意、办假报销等等贪污方式，便层出不穷了。而我为了要钱用，也就明知故犯，不去禁止，思想上横竖认为是公款公用，反正我和我的家庭，没有拿什么钱走。所谓应酬或涉及应酬的浪费，都认为是为团体、为部属，反认为我不负这个团体的责任，私人便没有用这些钱的必要。而对于为什么要用钱？——政治腐化；为谁用钱？——四大家族及个人利益；用的是那一些人的钱？——劳动人民的血汗。都未仔细去考虑过。所谓廉洁，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话，也可以说实际上就是贪污，并纵容了部属的贪污，也助长了社会坏风气。

二、一九四九年我在长沙起义时，外传白崇禧空运原第一兵团光洋几百万，铁甲车送光洋几十万，黄金几万两；兑换变卖盐款和银元券又多少万；送安江家属又带去光洋多少万，黄金多少两；总之这笔洋财，是不可以数计的。我因当时环境很险，没有心神和时间过问这些，同时对上述谣言，也无所闻。直至由北京回来，才知道有这种传说。我很清楚谣言的来源，是由于白崇禧在我起义后，向原第一兵团官兵广播，并散发传单，说他曾发了我多少钱，没有转发下去，引

起官兵们对我的怀疑，以达到分化之目的；部队中的坏分子便借此造谣，以图中伤。我对此事，一向认为无辩白的价值，是非真伪，自然会有事实证明。但也不能不承认，那时的经济情况，确实非常混乱，难免公私不分；乃至我在混乱中，也确有涉及贪污的事实。例如：（一）起义前两月，我兼任长沙警备区司令，以禁止现金出口的“法令”名义，扣留国民党中央经委会转达萍乡的现洋七万多元，报缴省政府。当时，程潜主任（兼省政府主席）在此款内提交第一兵团周转费一万五千元，后由家眷送往安江。长沙办事处长罗君南，正在安江筹设留守处，要求将此款连同他另所控制的五千元，共计两万元随同送往安江（这大约是谣传安江送款一百九十余万元的起因）。及至湘西解放，家属回来，始知此两万元，因突围叛军家眷过境，纷纷需索救济，最后仅留下六千余元，经两儿扬钊、扬铨将它变卖成黄金七十余两，我当即平均分给他们兄弟，作为今后生活费用。（二）起义后，我去北京一趟回来，我爱人说：财务科长谢家将送她黄金五百两，她即追问此金来源，据谢当面报告是用白崇禧未及运走的一批存盐变卖得来的。当时我仅留一百两交给爱人，其余四百两则提作省政府主席特支费，以应付当时非常局面所需要的开支。这四百两黄金，我在省政府主席任内，自起义赴京至第二年四月交卸时止，已完全用光，其中包括接济失业旧部，以及因家中减租退押、买公债等，可说是公私未分的。而留给爱人的一百两黄金则也在她病中医药费以及死后丧葬费开支内用完了。

现在，我的经济状况是：醴陵全部田产已由土改时扫数交还农民，押款也已全部退清。衡阳及南京的房屋，正在办理手续送清当地人民政府接管设法利用，我不再继续占有。只有桂林还有一块地皮，尚未处理，醴陵有一栋房子，仍为我侄辈暂住。长子扬钊已成家，能自食其力；次子扬铨，亦快大学毕

业，不久可独立生活，我在经济上的包袱，已很轻了。

二、学　历

我小时候在家乡的私塾，读过几年旧书，然后进入高小，在高小只读一年。到一九一五年便因费用太大，负担不起而中断了，但仍然在附近补习一年。一九二〇年才跑到长沙，投考兑泽中学。毕业后在家乡教了一年小学。那时小学教师待遇菲薄，没有余钱拿回家，帮助家庭解决困难，大为我的祖母所不满。因为她本来是不很赞成我读书的。读了书还是无出息，更加触动了她的愤怒，终至闹到不肯让我在家停留的地步。我当时也感觉到教小学不是出路，家里既无法容身，于是决心外出，准备跑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一天晚上，暗地偷回家中，要求我父亲给我三十元银洋作旅费，并表示从此以后，再不会向家庭有所索取了。当时父亲瞒着祖母给了我旅费，次日一早，我便背起一个包袱，踏上了投笔从戎之路。而知道我去的，只有父亲和我爱人，祖父母和兄弟都蒙在鼓里。

我于一九二四年单独一人到了广州，时机不巧，黄埔和讲武学校都已不再招生了。同时，同乡青年还有很多人一样向隅。后来，我因潘培敏的介绍，见到了军政部讲武学校教育长李明灏，得到李的特别关顾，而被例外地收下了。讲武学校的校长是程潜，监督周贯虹，教育长李明灏。校内分为四个队，第一、二两个队为学生队，第三、四两个队为军士队，我是参加第一队的。我进讲武学校时，该校已经开课很久了，完全采用军国主义的打骂教育，同学操练不好，动不动就遭受体罚。伙食、被服都不周全，言论更被周监督所限制，引起大家不满。但又不敢正面反抗。我在学校本想埋头学习，但由于到校后，学术各科都能赶上人家，表现了特殊的才智，博得老师、同学的推重，他们希望我在这时，对此事有所主张。一天晚上自习时，我便号

召全体同学正式向学校提出改善生活的要求，并且立即得到全体同学的拥护。而当时学校认为我们这是造反。第二天，周监督召集全体同学追究，并说这是违反纪律的事件，全体同学都要受处分，而倡首的尤其要军法从事，责以军棍，并查问谁人为首。这时，我即挺身而出，自认为首，并说这种合理要求是应该提的。当时周认为我还坦率，乃从轻改责于心二十下了事。这是我生平求学以来第一次受到处分。当时我思想上认为，我们这种要求是正义的、反压迫的，而竟得到如此处分，因此，对周深为不满不服。

这年冬季，校长程潜被任命为攻鄂总司令，将出发攻打武汉。有一天，大元帅孙中山及党代表廖仲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等，到学校讲话。孙首先宣布程校长须出师北伐，不能兼顾校务，今后讲武学校合并于黄埔军校，由蒋介石负责，这时第三、四两队已先毕业随程出发，只有第一、二两队是等待合并的。可是隔了很久，合并未曾实现，恰逢周贯虹又发表为赣军总司令，于是有人说，第一、二两队要提前毕业，作为周的赣军干部，不合并于黄埔了。同学们听此消息，深为不满，认为我们都是大元帅的学生，他已吩咐学校交蒋介石合并办理，周某不能擅自改变这个计划。当时，我们集议，推选代表十二人到黄埔去质问蒋介石，为何迟迟不来接收？我也被推为代表，而且为十二代表的率领人。我们事先向学校请假不准，并被大骂一顿。我们无可奈何，只好不顾一切冲出校门，跑到黄埔。到黄埔军校见到蒋介石以后，我们表示欢迎新校长，希望早日实行合并，更说出周的用心。当时蒋答复说："合并迟早要实现，但目前还有某些困难。至于周想私自将你们提前毕业，是决不可能的。"蒋吩咐我们回去好好安心等待。当时，我们告以未经学校准假，而是冲出校门跑来此地的，回去一定会受处分。蒋说："你们拥护大元帅，欢迎新校长是光明正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我可以派人护送你们回去。”于是派了军校秘书袁同畴把我们送回了讲武学校。但我在此时又和另一个同学，跑到党代表廖仲凯、俄国顾问鲍罗廷处报告此事，没有随同袁一同回校。当袁同畴等未到学校以前，学校已宣布将我们十二人开除学籍。后来看到大家是经蒋派袁护送回来的，学校才收回成命。但袁去了以后，学校又挂牌把我们十二人开除，并指明陈明仁除被开除外，还要扣押。不久，我坐了廖仲凯给我们乘的一辆汽车回到学校。一进校门，校方便将我扣押起来。这时已是深夜，同学们知道我已被扣押，于是大闹起来。我当时想出来向同学们说话，而值星官李国良制止不许，后来鉴于同学们情绪激昂，才集合了大家由我出来说话，我说明我们见到了蒋介石，已得到好的答复。并劝同学们解散，安心睡觉，等待发展。同学们也就风平浪静地散了。可是学校方面看到我的能量如此之大，大为震惊，害怕将来弄得不可收拾。于是区队长林柏生、惠济、乐钧天等出来调解。调解的办法是：由所有区队长联名向校方担保不开除我们。我们当时认为学校出尔反尔，毫无诚意，一致不接受区队长的调解，甘愿被开除。因此十二人当晚即愤而离校，千方百计找到了一个小学校借住了一晚。次日早晨，即将服装脱下，交回学校，以表示我们的决心。这一天，我又被十二个同学推派，去见蒋介石。蒋当时知道我们的情况不妙，深为同情，答复马上帮忙处理。他先要我们搬到旅馆住下等候。当时，我们和讲武学校同学间的联系，还是密切保持着的，联系的办法，便是与学校每天外出采买的同学交换意见。某天，同学中特别选出一位能干的同学当采买来和我们商量。商量的结果，决定每天推选十二人为代表向学校交涉。第一天的如被开除，则第二天再推选十二人，如此继续下去。果然第一天的十二名代表被开除，第二天的十二名代表也被开除。这时，学校感到事情严重，才与蒋介石具体交涉合并办法。不到

几天，我们学校就合并到黄埔军校了。合并时，周贯虹向蒋介石提出了五个条件，其中有一个是，不得收留被开除的第一批学生。当时蒋也答应了。可是在合并之先，蒋介石便派人到我们住的旅馆，付清用费，接我们十二人先到黄埔。等讲武学校全体同学并入黄埔时，我们十二人，已经早编入黄埔第六队了。这是我由讲武学校转入黄埔的经过。

黄埔军校原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队，以及五队一个队。一、二、三、四队为黄埔第一期；五队为第二期。讲武学校的学生并入后，编为第六队，但仍为第一期。第一、二、三、四队，比我们早三个月毕业，第六队则迟三个月在东江毕业，当时校长便是蒋介石。

我在黄埔军校专心读书，除参加"血花"剧社外，没有参加过其他活动。当时学校内有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两种组织。我一概都未参加。未参加的原因是，我认为我要做一个单纯的军人，不愿沾染政治关系。这种政治性的组织活动，对我个人的发展是无多大帮助的。不过在上战术课时，我往往有些闹事，与教官为难。因为教官所讲的内容，我们早已在讲武学校学过，再学没有兴趣。战术教官刘尧震，每次遇着闹事的时候，便把闹事的人名记在本子上。他对这些人特别注意。而我后来得到刘尧震的信任，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一九三二年，我在八十师任副师长的时候，我曾被调到庐山训练团第一期受训，并兼了一个教官的名义，但实际上我并未到职，经常逗留在醴陵、南京等处。等到第三期的时候，我又由八十师师长之职调去受训，并任该团第三营副营长。我因为在八十师没有完全接受我的上级、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要我杀害一批经红军训练后释放回来的被俘官兵的命令，大为蒋鼎文所不满，定要惩罚我。于是借调训的名义，把我的师长职务解除了。所以在庐山受训完毕后，被调任为第二师的参谋长了。

到职还不到二、三个月，蒋鼎文知道了我任参谋长，仍不甘心，又建议将我免职。我被免职后，很久没有实际工作。我于一九三五年进入陆军大学第十三期学习。为时一共三年，一九三七年，陆大暑假期内，我又被调到庐山训练团任区队长三个星期。一九三八年上期，抗战正在进行，珞珈山又在训练干部，我又被发表担任女生队长。但因另有任务，并没有到职。庐山军训团的团长是蒋介石，副团长是陈诚，以下各职都由现职高级将领担任，而受训的便是从各部队调来的中下级军官，或各行政机关的重要干部。训练内容，注重精神思想方面，主要的是要大家一致团结，从事于所谓安内攘外、拥护领袖、复兴民族。而安内就是剿共，攘外就是抗日。这替后来抗战时期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至于在当时由这种训练所造成的剿共的实际军事行动，就更不必说了。陆大是当时国民党政权下，唯一的最高军事学府。它专门研究军事理论和现代化的高级军事战略、战术，政治课根本没有。校长杨杰，是当时中国杰出的军事理论家，但他和蒋介石、何应钦意见不合，常为蒋、何等猜忌。解放后，杨杰准备由滇经香港北上参加政协会议，被特务杀害了。我当时进陆大，并非真正有心深造，而是为了三个原因：（一）我当时闲着无实际工作；（二）想加造资格；（三）藉此等待好的机会。所以在校三年，根本没有学到什么，甚至后来什么课都未去上过，而考试时要完成各种课程的答案，则都请同学代庖。例如戴坚、陈庚、黄彬、韩浚章等同学，都是我经常固定委托负责作答案的。这样混了三年，于一九三九年春毕业。

一九四三年，我在云南任七十一军副军长时，兼任驻滇干训团第一期步兵大队大队长，第二期将官研究班主任，及第四期副教育长。那时因"准备美械"，教育内容完全是学习美械的使用，纯是军事技术，没有政治课程。我任第一期将官班主任

时，曾率领受训人员，到印度蓝姆茄美国步兵战术学校去受训。当时受训的有团长以上，乃至军、师长职级的人。而教练都是美国下级军官，甚至是士士，学的又是一个兵的基本动作。如步枪如何拆卸、洗擦，如何射击之类。

大家都认为他们这是故意侮辱中国人，因而深感不满。我个人更是高高在上，根本不太去过问。

下面我讲讲自己的主要经历。

三、主要经历

一、惠州之役

我一九二四年在黄埔军校毕业后，便在一九二四年的八个月之内，因战功一连接着由见习排长而节节升任排长、连长，以至营长，参加了广州北伐前有名的东莞之役、惠州之役两次战争。

我最初由讲武学校编入黄埔军校以后，因为战术课程在讲武学校已学过，对于战术教官刘尧震每次上战术课，不能特别引起兴趣，往往当场吵闹。刘也每次都把吵闹的人名记上，反而另眼相看，认为这些人是胆大有为的。因此，在第一次东征时，军校教导团围攻淡水之役，刘尧震为营长，曾将平日闹事的都调到营部见习，我便是其中之一。不久，我被调到第二团任少尉排长，后来刘任第四团团长，他又把我调到第四团一营三连当中尉排长。其时，当我们的连长的都是黄埔军校一、二队的毕业生，我们瞧不起他们，常常闹不团结，记得我在第二团当排长时，还曾因事打过连长，结果刘仍庇护我，把我另调一连，而未加处分。但是连长对我怀恨在心，当我们驻虎门时，有一次，连长居然设计来暗害我，请我和另外两位排长，同到馆子里吃饭，首先灌我们的酒。酒醉后，又带我们进妓院玩

一晚。因而三人都得了花柳病。其他两个排长患病后，便进医院治疗，我则坚持下去，不愿示弱。有一次下操，副营长张际春知道我在尽力勉强支持，特嘱我下去休息。后来连长知道了。认为我未经许可擅离操场，要求营长给我处分。营长杜从戎转请团长刘尧震处理。刘即叫我去一下，当我见到他时，他只亦庄亦谐地说了一句："为什么你们一玩就会得病，我生平玩了一辈子，都未得过病。"并未加责备，而且要我仍回连队去。对于连长请求处分的事，根本不议。因此，我的气焰更加高涨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蒋介石下令缴郑泳琪的械。一天晚上，由虎门向东莞出发作战，那时营长和副营长都因我有病，要我留在后方，但我自己坚决要求去。因为一则当时年轻，好胜心强，不去怕背上一个怕死的声名；二则认为我是由讲武学校编入黄埔军校的，非蒋嫡系，已经被人轻视，如果临阵退缩，则以后更无出人头地的日子；三则刘团长对我太好，我非替他出力不可，于是决定带病出发。但我始终由两个兵扶起走，走到快天亮时便停在地下，寸步难移了。副营长张际春见我病重，定要派担架把我送回后方，我坚决不肯。一会儿，拂晓攻击开始了。这时第一营接受攻击任务，我们第三连本是作预备队的，但首先望见东莞东门的一个山头，有很多敌人在企图抢山。营长当时便要我们第三连首先占此山，而连长竟下令派我第一排去攻占。我当时认为自己病得不能动，而他偏要我首当其冲。这是连长故意与我为难。我气愤之下，忘记了痛苦，一个人身先士卒，爬上此山，指挥部队将此山头占领，并一鼓作气，趁敌人未攻之前，先行攻击，带领全排勇猛冲入敌阵，猛打猛冲，结果缴了敌人一营人的枪。缴获数目之大，以我排为最。团长认为我战功卓著，一面到黄埔报功，一面将我升为本连连长，而将原来的连长调开。



一九二五年，广东政府第一次东征，久攻惠州不下。到了第二次东征的时候，对于惠州乃采取监视政策，并无再攻之意。但刘尧震自告奋勇，愿以所带的第四团攻打惠州，自信一攻必克。而当时负指挥之责的蒋介石，也就寄希望于刘尧震，把攻惠州的任务交给了他。当部队由东莞向惠州进发时，我病已经转剧，多人劝我回后方休息，而我仍然不肯示弱，坚持要去参加战斗。由于张际春让了一匹马给我骑，不需步行，减少了一些痛苦。

开始攻惠州的日子定在十月十二日。首先挑选奋勇队，我这连被挑了二十余人，以杜从戎为奋勇队长。当时的兵力部署是，第一、第二两营担任攻击，由北门进攻；第三营监视西门。这天早上开始攻击，一接触，便死伤很多。第一营营长，第一、二连连长都负了伤。因而攻击任务，未能达成。下午团长命令我带第三连增援。我接受命令后，立即准备攻击。惠州城四面皆水，要跨过一座桥，才能达到城边，地势极为险要。我受命后率领全连的兵力，冒着炽烈的炮火，先抢过了桥，离城已经很近了。但因预备的一些爬城用的梯子，都放在桥那边，抢过桥时没携带，没有梯子无法上城，又只得到桥那边将梯子搬来。在桥上一来一往过了很久，敌人用密集火力射击，我连死伤很大，结果只搬过来八张梯子。当梯子搬过来时，团长刘尧震已达到我连的位置。他知道我已搬过来八张梯子，就命令我准备赶快爬城。就在他吩咐我的一刹那间，忽然敌弹飞来，中了他的要害，他马上阵亡了。我当时认为，我当学生以至现在，都是受刘的爱护，对他特别感激。现在目击他死在我身边，我不禁悲愤交加，对于敌人的仇恨，急剧增长。于是不顾一切，带着一连兵力，冲锋前进。但因梯子搬不上，仍是无法上城。这时，天色已晚，阵地上的士兵，在敌人火力的监视之下，根本不能再动，茶饭也都没有，我只好冒险来回行走于阵地上，亲

送茶饭给每一个士兵。并把阵亡人员所遗下的枪枝收拾，交给伙夫带回后方。团长死后，由副团长黄庚矱和一少校团附负责指挥。这天晚上，副团长接到何应钦的命令，无论如何要限当晚将惠州城拿下，否则军法从事，副团长接命令后，马上找我去接受这个攻击使命。我当时坚持当晚不能攻击，理由是兵散无人掌握，加之官长多负伤阵亡了，力量不能集中，梯子也背不上去了，即令能攻入城内，晚上无法清扫敌人，也是不能坚守的。但副团长懦弱无能，毫无办法，他对我的主张又不敢呈复，要我自己写报告复何。我便把不能当晚攻击的理由，写了一个报告由副团长转给何应钦。何接到我的报告后，随即来令要我指挥第一、第二两个营，于明日拂晓攻击。我接令后，立即准备收集队伍，并拟以一夜之力，把梯子搬靠城边，但经过通宵的努力，一、二两营能收集的士兵不足一百五十人，八张梯子也只搬了一张靠近城边，其余七张因城上炮火激烈，使人寸步难移，未能搬去。同时，原来规定拂晓攻击的信号为打十发炮弹，准备在打到第三发炮弹时，便开始冲锋；可是届时一直没有听到炮声响，不知究竟是什么原因？等了一会，接何应钦的命令，说要重新布置，并要把监视西门的第三营由西门调来，同时发表第三营营长惠东升为代理团长。我接到这个命令之后，马上松了一口气，以为攻击惠州城的任务是第三营的了，可是事实不然。惠东升代理团长以后，却仍然给我命令，要我指挥。将第一、第二两个营，编成七个队，每连一队。我连人数多一点，便编成两队。每队带一梯子，并指定攻击目标。到时，各向攻击目标冲锋前进，时间为下午一时，仍听炮声三响为信号。届时我一切准备妥贴了，炮声一响，我便带了七个队，冲锋前进。但在这个时候，眼看到凡属前进的都倒下了，再也不能抬头。我心里很着急，于是只带着一个号兵，手中拿着一面旗子，吹着冲锋号，猛向前冲。但是回头一看，部队并未行

动。这时我军已经完全暴露在敌人视线之下，前后左右，都是死的伤的，号兵也死了。我在这万分紧张之际，仍拿着旗子向城下跑。经过几段跃进，才到达了先天晚上放梯子的位置。这位置处在死角，比较安全。当时，城楼已经被打垮，城墙出现了缺口，机枪步枪对城下射击还是很密，不过敌人打不着我。我站了约半小时，一直看不见我们部队的一个人。过了一会，才陆续发现来了两个士兵，是第一连的。我把他们叫到面前，商量爬城计划，计划结果是我们三人一齐爬城。于是，由我领头，他们两人跟着我前进。当时，我身上带了一支驳壳枪，四个手榴弹，手里仍然拿着一面旗子。当梯子刚竖起来，我便拿着旗子沿梯而上。等到梯子靠到城墙，我已跃上了城墙顶。到顶上后，首先以手枪向敌人射击，接着抛掷手榴弹，敌人猝不及防，立即四散。等我继续抛掷两个手榴弹时，旗子已插上城头，并眼见敌人开始溃退。我们城下的队伍，也蜂拥而上。惠州城终于被我们占领了。这是十月十三日下午四时的事。第三天，蒋介石、何应钦偕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在惠州集合全体部队，由蒋介石亲发口令，吹三番号向我敬礼，并宣布命令，升任我为第三营营长。

二、九江会议和预二师

一九三八年春，我在陆军大学毕业后，由于何应钦的关系，被派到军政部当部附。在此期间，曾一度被派为点验主任，负责点验湘、赣、浙三省的部队，接着点验四川部队，因为一度被发表为第六辅习训练处处长，四川并未去了。但辅充兵训练处也未去到差，又于六月底发表我为第二预备师师长。原来第二预备师是由贵州保安团队编成的，师长为贵州人冯剑飞。部队由贵州开到岳阳时，才装备武器；装备后，又由岳阳开到咸宁。这时冯剑飞去见蒋介石，蒋问这个部队能否作战。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